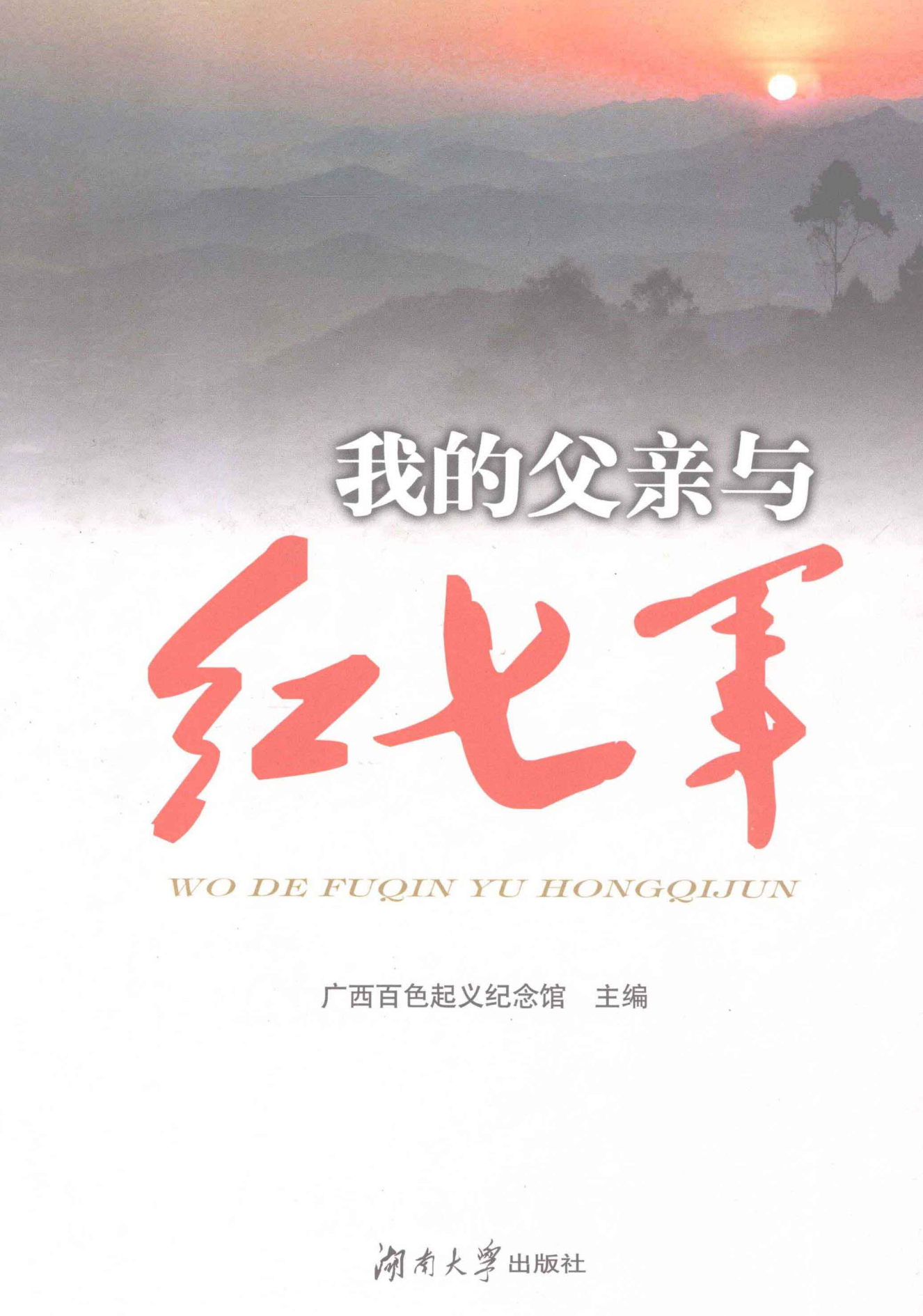




我的父亲与 红七军

WO DE FUQIN YU HONGQIJUN

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谨以此书向建党90周年献礼

我的父亲与 红七军

WO DE FUQIN YU HONGQIJUN

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 主编

顾 问	吴忠才	陈欣德	庾新顺		
策 划	陈俊达	黄小卡			
主 编	黄 芬				
副主编	廖永东	黄丽娟	覃卫国		
编 委	韩永保	麻 高	王昌文	黄建清	苏 铸
	刘小立	陈文静	黄伟媛	苏晓莉	李亚滨
	袁渤海	云奋生	孟春飞	杨长城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红七军老战士子女的角度回忆父辈革命战争年代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忘我工作、尽瘁国事的感人事迹及日常生活中平凡而又伟大的另一面,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热爱人民、无私奉献、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父亲与红七军/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主编.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1113-993-8

I. ①我… II. ①广… III. ①革命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6561 号

我的父亲与红七军

Wo de Fuqin yu Hongqijun

主 编: 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

责任编辑: 全 健

责任印制: 陈 燕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094(编辑部),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 437291590@qq.com

网 址: <http://hnupress.com>

印 装: 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6 开

印张: 15.25

字数: 353 千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13-993-8/K·49

定价: 7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出版社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由数十位参加百色起义的红七军将士的革命后代，以追忆缅怀之情，穿越时间的隧道，重拾岁月的光芒，抒写其父辈们生前的经历和许多动人的故事，形成了《我的父亲与红七军》一书。这本书不仅记述了部分红七军将士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党史、军史的资料和内容，同时也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为此，我深感欣慰。

难忘的1929年12月11日，我和我的战友们参加了由邓斌（邓小平）、张云逸等发动领导的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百色起义是继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在西南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又一次规模宏大的武装起义，和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百色起义后，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桂、黔、湘、粤、赣五省转战七千余里，于1931年8月到达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汇合成革命武装的滚滚铁流。在艰苦的环境下，撒播了革命的种子，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年，我和我的战友们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参加了革命。在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是在艰苦的长征路上，我们都怀着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激励自己艰苦奋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亲历血与火的斗争中，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而焕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作为这支部队的唯一健在者、年过百岁的红七军老战士，在看到这本书的初稿，阅览战友们生前的故事时，往事历历在目并勾起我的回忆：当年邓政委、张军长和那些熟悉的战友面孔，又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忘不了那转战千里的豪情，忘不了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更忘不了许许多多九死一生的拼搏……

如今，我的7800多位生死战友都已先后离我而去，长眠在祖国的青山大地。我怀念他们，敬仰他们，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优秀的炎黄子孙。现在，在百色市的迎龙山、卧龙山上矗立着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和百色起义纪念馆，馆里陈列着战友们的遗像、遗物和事迹，这正是神州大地埋忠骨，巍巍龙山立丰碑！

《我的父亲与红七军》一书的出版，得到了百色起义纪念馆的鼎力支持，也凝聚了

黄芬馆长的不少心血。在此，我以一位红七军老战士的名义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发行，红军精神代代相传。我更希望广大青少年学习革命前辈为国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操，积极投身于当前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黄芬
2010.12.11

（作者系红七军老战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目 次

深深怀念我们的父亲张云逸	张远之 王 婷 (1)
我的父亲陈豪人与百色起义	陈超子 (4)
父亲的美德令人难忘	李应芬 (17)
父亲韦国清的几个片段	韦国清的子女 (26)
深切怀念我们的父亲覃应机	覃晋桂 覃广山, 等 (38)
从百色起义走来的陈漫远将军	陈南竹 覃北乔 (54)
云广英亲历的往事	云奋生 (66)
父亲李天佑在红七军百炼成钢	李亚宁 (75)
怀念我亲爱的爸爸——韦杰	韦娜莎 (81)
我的父亲对百色起义的点滴回忆	冼 玲 (85)
拳拳赤子心	莫晓萍 (88)
忆父亲覃健将军	覃襄安 (91)
父亲袁任远在红七军的战斗历程	袁贻滋 (95)
难以忘怀的往事	卢娅春 (99)
朱鹤云在越南	朱小光 (102)
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足迹	吴万章 (105)
追忆父亲的戎马往事	欧阳严 (116)
我的父亲——姜茂生	姜 华 (119)
我的父亲袁也烈和红七军红八军	袁渤海 (121)
通过我的经历回忆父亲	黄星旗 (127)
我们的父亲肖远久	肖 林 肖继丹, 等 (130)
我的父亲张震球从玉林到百色	张建华 (134)

无怨无悔坚韧不拔 一生追求跟着党走 黄桂沈 (149)

坚强不屈浴血奋战在右江地区 黄邕生 (166)

我的父亲覃国翰的戎马生涯 覃新民 (182)

回忆我们的父亲阮平 阮英利 阮英华 (184)

时刻怀念亲爱的爸爸 赵树范 赵树远, 等 (193)

草鞋·父亲 孟春飞 (201)

回忆父亲黄明政 黄正新 黄中凭 (203)

缅怀我们的父亲陆秀轩 陆晋生 陆延生, 等 (219)

光辉灿烂的一页 覃永春 覃永宁, 等 (225)

在战斗中成长——我的父亲黄征的革命历程 黄汉生 (230)

忆父亲 杨长城 (233)

后 记 (236)

深深怀念我们的父亲张云逸

张远之 王 婷



张云逸

值此百色起义及红七军建立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我们的父亲张云逸。他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将永世长存。父亲戎马一生，南征北战，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是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3名军事家之一，是我军参加过辛亥革命武装斗争少数的几位高级将领之一。

父亲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虽然贫困，但还是省吃俭用送他到本村宗祠学堂读书。父亲为减轻家庭负担，勤奋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家务和生产劳动。在贫苦的生活中，父亲深刻体会到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决心寻找改变贫困的出路。青年时期，他夹着母亲亲手做的一双布鞋，打着赤脚从海南跑到广州，到了市里才把鞋穿上。他在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小学。16岁秘密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1年19岁时参加辛亥广州起义，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在与清军激烈的巷战中，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父亲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第二天清晨父亲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听情况，寻求突围道路。返回时，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并枪杀于路口。事后，广州人民共收殓了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听父亲说过：“我如果不是那天出去寻找突围之路，那就会是七十三烈士了。”

1926年父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他看到北伐中共产党员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又秘密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反帝、反封建，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1926年10月，父亲在武汉加入共产党。我们不

止一次听父亲说：“我入党时年纪已经很大，在军中职务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苦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

1928年8月，父亲在上海，原来组织上准备派他去苏联学习，但在这时，蒋桂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党中央便决定派他去广西，抓紧有利时机开展革命工作，不去苏联学习了。父亲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立即着手到广西去的准备工作。1929年5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出生才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和邓小平一起领导了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到达中央苏区，参加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家里没有父亲的任何音信。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地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其工作，组织上将母亲和远之接到香港与之同住。这是相隔八年多之后，一家三口第一次重逢，当时远之已经9岁。即使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奔走于港、澳、粤、闽、桂等华南地区开展工作，也难得有相聚的机会。还没来得及熟悉，父亲又被党派去组建新四军，1938年初就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七个月后，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才再次重逢。

1949年三大战役胜利之后，百万大军又奔向解放南方的战场，党中央高瞻远瞩早已着手部署新区的接管和建设问题。1949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广西省的党政军一把手。于是他在华东通过各种渠道首先将原在红七军、广东东江纵队、两广地区工作过的、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组织起来，一个个地亲自谈话，征求意见，为广西解放后接管各级政权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同志都满怀信心地和他一起工作，不怕艰难险阻，决心为建设新广西贡献自己的力量。此后，又吸收了大批南下干部和经过党教育的大、中学生到广西。

1949年12月，百色起义二十年后，父亲以广西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重返战友们曾并肩战斗、流血牺牲的地方。父亲百感交集地说：“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广西的政权已被夺回到人民的手中。我们一定要把广西建成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广西。”当年的广西非常落后，没有工业，没有铁路，只有崎岖的山路。农业也很落后，大多数农民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土匪活动猖獗，民不聊生。年届六旬的父亲经常乘坐吉普车到农村去了解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改情况。他用带海南口音的广西白话向农民宣讲政策，访贫问苦。因路途遥远，下乡时常常自带干粮和开水。一次，他下车到农民家去，警卫员提着热水瓶在他身后随行。他发现后叫警卫员把热水瓶送回去，说：“我们到农民家去，喝自己的水，用自己的杯子，这还算一家人吗？农民会对你说心里话吗？”此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他也曾驱车数百公里到桂北，给新参军的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学员作报告。

父亲日夜操劳，广西艰巨的剿匪任务和巩固基层政权的工作使他经常夜不能寐。远之常看到父亲的卧室兼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在炎热的广西，房间里连电风扇都没有。他打着赤膊，穿着短裤，或坐在办公桌前，或站在挂满墙的地图前，不停地忙碌着。当时在这位省主席的住处，连冲凉的地方都没有，上厕所要到机关后门外一片水田上的小木棚去。年老体弱的父亲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压力下病倒了，他患了急性胆囊炎和胆结石。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工作。1951年下半年，广西的剿匪、镇反以及恢

复经济的工作基本完成后，他离开广西去治病。毛主席曾几次亲笔致函，嘱他安心养病。

1954年身体好转后，父亲调到中央工作。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广西代表，并被选为人大常委。父亲仍继续关心广西的工作，和广西的干部、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父亲热爱这块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对共同战斗过的战友、同事和广西的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广西去搞调查研究，找干部、群众开会，听取意见；他多次到贫困的百色地区视察，亲自到有困难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也和当地群众座谈，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他和母亲一起到韦拔群烈士墓扫墓、献花，为红七军烈士纪念碑题词。父亲说：“我是广西的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实事。”他认为要改变广西经济的落后局面，必须发展交通运输事业，要修公路、修铁路，特别是需要有一个出海口。他向中央和有关省积极陈述理由，坚持把钦、廉地区划归广西。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使广西有了出海口，为广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他鼓励广西发展地方工业，发展有亚热带特色的农、林、牧、副业；他多次到工厂、农村视察，并把广西建小电站的经验向外地宣传推广。

父亲对儿子、儿媳和孙辈们都是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要求子孙好好学习，要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搞特殊化，不要脱离群众。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学习，在工厂农村劳动，在部队服务，都常接到他的亲笔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同志式地讨论问题，鼓励我们上进，鼓励我们和工人、农民交朋友，保持联系。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失去父亲的侄子、侄女。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到广西，给地主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送她到学校读书，把她培养成一名军医。念环妹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像是我的亲生父亲。”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衣着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又补。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常教育我们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还在各个房间里贴上亲笔写的“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现在我们仍坚持用洗澡水、洗衣水冲厕所，用洗菜、洗米水浇花。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祖国、对人民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世代相传。

我的父亲陈豪人与百色起义

陈超子



陈豪人

1940年8月13日父亲陈豪人牺牲时，哥哥陈明扬6岁，我4岁。因父亲常年在外参加革命，很少在家，故我对父亲没多少记忆。以后从父亲战友的回忆及一些革命传记中，我对父亲有了一些感性认识。为了追踪父亲在百色起义及红七军创建过程中的足迹，我翻阅了一些当年的党史文献，对父亲在这段革命历程中的情况及功绩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附带说明，误传父亲是高度近视眼，其实父亲视力很正常，只是偶尔戴了副眼镜，照了一张照片而已）

一、陈豪人简介

父亲陈豪人（1907—1940），又名陈昭礼、陈导民、陈希周、陈才等。1907年3月出生于福建福州市，取名为陈昭礼。1923年父亲中学毕业，只身到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上海，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在校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复旦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带领同学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对军阀、日本统治，声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12月至1929年6月父亲为中共福建省党组织早期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3月父亲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福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奉命潜入福建恢复、整顿、重建中共福建党组织并开展工农运动。先后任中共闽北特委书记，中共福州地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到广西前为中共福建省

委代理书记。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广西南宁做统战和兵运工作，主持中共广西军委，改名陈豪人（《英雄百色》一书中有记载）。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

1929年12月至1931年2月期间，亲自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为红七军主要领导人之一，曾先后担任红七军前常委、前书记、政治部主任、兵委书记、二十师政委等职。

20世纪30年代投身抗日战线。1931年赴福州参加福建事变；1933年在香港领导抗日同盟，任群运部长。1938年为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秘书，任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同年，被党中央派赴国民党七十军，任军部上校参议兼抗日培训班主任。1940年由于身份暴露，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在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的安排下转任全国战地委员会少将委员。在前往巡视第三战区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陈昭礼（陈豪人）17岁，
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

二、在广西积极为武装起义创造条件

1929年上半年蒋桂新军阀混战，桂系军阀失败后，国民党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希望得到共产党的帮助。1929年6月父亲奉命到广西参与主持广西军委工作，改名陈豪人。中央派了40多位党的军事、政治干部到广西，多数党员与父亲单线联系。袁任远回忆：“我到教导总队受陈豪人单线领导，直到百色起义时，党组织才公开。”

1. 为武装起义组织革命队伍

父亲以广西省政府机要秘书身份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利用其特殊的身份之便，中央派到广西的大部分同志，是通过他和俞作豫等向俞、李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如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兼任副大队长，袁任远到教导总队。父亲考虑到今后战争的需要，从福建调军医吴清培到四大队，吴清培后任红七军军医处长，长征时牺牲。

1929年8月底9月初，中央派党代表邓小平到广西主持党的工作和广西军委工作。邓小平同志到广西后，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我父亲接上关系，此后，中央的指示和邓小平的意见，主要通过父亲和俞作豫等联系上传下达、贯彻执行。在邓小平和父亲的领导下，全面开展党的工作，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完成兵运、农运、工运工作，恢复和发展广西地方党组织。改造、组建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及教导总队，后来这几支队伍成为红七军、红八军的骨干力量，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奠定了

基础。

2. 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父亲一到广西就注意以共产党人的求实作风去影响国民党上层人物。帮助、争取李明瑞，并送给他《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革命书籍，经常与他推心置腹地交谈，与李结下革命的友谊，使他逐步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并表示了“殊途同归”的夙愿。1930年初，经父亲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参与领导南宁兵变

党通过邓小平、陈豪人对俞作柏、李明瑞联合反蒋行动进行诚心劝告，指出他们内部不一致，来广西时间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薄弱，贸然行动，必然失败，但他们未接受劝告。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陈豪人积极做好应对俞、李反蒋失败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做好接应南宁军队撤退到左右江的准备。10月初，俞、李失败后，俞作柏出走香港。

《广西通志·军事志》记载：“中共广西军委决定，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开赴左江，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率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开赴右江”（当时前委还未成立），准备武装起义。

10月22日，邓小平和父亲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抵达百色。到百色后，邓小平、张云逸、何世昌和父亲等共同策划在右江举行起义、创建红军和成立苏维埃政权等事宜，并拟订了前敌委员会名单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报请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批准。

1929年10月30日广东省委任命邓小平为广西省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书记，父亲和张云逸为常委。11月初，从南宁派往香港向广东省委和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前委召开会议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前委又派龚饮冰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贯彻中央指示准备武装起义的情况。

三、前委领导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0年1月前委书记陈导民给中央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平兄前得中央电召，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硬要去，在龙变前一天已行。故中央走（来）电阻之回去已不及。工作召（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平兄为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前委书记陈导民

“龙变”，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前委书记邓小平在1929年11月初离开了广西百色到上海汇报。起义工作由前委负责，父亲挑起了主持前委工作的重担，年仅22岁。

1. 前委确定了百色起义的时间

父亲在《七军前委报告》中写道：“龚同志衔中央及粤省委命令来要第四大队即速转变，并限定龚同志到后，不能超过十天，即须动作。”前委讨论后，认为“限定十天，未免过于机械，而且在工作上准备亦需略费时日。若在十天内转变反因准备工作太差而得不好结果。故前委决定最短时间内以极紧张之精神，使工作上略为布置就绪，即行动作。及后工作上准备略有头绪，且因政治环境的迫切需要，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伟大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发动整个的转变计划”。前委根据起义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决定了百色起义时间。

2. 起义前夕的大量准备工作

1931年3月9日父亲向中央汇报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以下简称《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前夕的准备工作：“当时军委（左右江军队中党的最高机关）即照以下策略进行：（1）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充分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2）改造第四大队，逐渐撤换反动军官，加强士兵工作，改造士兵成分（增加大批农民入军队）；（3）号召群众并以军队力量协同群众扑灭豪绅武装；（4）解决第三大队，围缴其枪械；（5）扩充新部队，培养新的干部。”

根据以上策略，《总报告》中写道：“我们到右江第一天即开始武装农民，运来之五千杆步枪，大部分都是分给东兰、凤山、奉议、平马、果德、向都等六县农会，以武装群众，组织农军。”并动员群众参加反豪绅的斗争。

12月1日建立了铸币厂、红军被服厂、兵工厂等，做了大量物资准备工作。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全军士兵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起义总动员。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当天晚上，有效地控制了百色县县长等各种危险分子，迅速地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积极筹措活动经费，完成了起义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3.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29年12月11日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百色城东门广场，还有数千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他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父亲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红军了！

当天，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张云逸同志及父亲宣布就任军长及政治部主任职务并宣布了政纲。

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红七军成立之后，一切行动均受前委指挥，并确定了红七军的行动策略，即暂在右江各县实行分兵游击，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后百色、恩阳、恩隆、奉议、思林等十余县，纷纷建立了苏维埃及革命委员会，又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

4. 前委发布了《实施政纲》、各类通告及评论员文章

父亲陈豪人领导的政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发布了《实施政纲》、各类通告及评论

员文章。前委拟定了《中国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其第四条明确提出“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会合，实现割据两广！”“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及“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及发展方向。

1929年12月18日，在前委及政治部驻地清风楼创办了《右江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目前主要的任务》，贯彻红七军政纲。文章中规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一）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二）扩充工农赤卫队；（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

这就清楚地表明：前委的同志们一直注意把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紧密结合，符合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思想。

1929年12月20日发布了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通告明确指出：“党能否加强对红军的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关系。”还规定：“地方党部与所在当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的指挥。”提出政治部负有“侦探之战斗”的职责，“纵队设政治部”，以便前委直接掌握军事信息，指挥军事行动，保证了党指挥枪；提出建立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坚持集体指导等原则，确立了红七军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方针。

1929年12月发布了《国民党罪状（一）、（二）》《我们的主张》《右江苏维埃政府口号》《右江苏维埃各级政府组织与职责》等文告。这些重要政纲、文告、命令、标语从前委及政治部驻地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陈豪人等还开办了教师集训班、军政干部训练班，并亲自授课，以提高干部的水平。

四、百色起义、红七军建立期间的领导班子情况

1929年12月25日《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平礼兄转前委……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如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中，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为陈昭礼即陈豪人）

陈导民（陈豪人）的《七军前委报告》中，记载当年红七军领导班子的情况：“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入、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由上述可知，在邓小平离开百色、红七军成立的一段时间里，陈豪人为红七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七军前委报告》中敦促龙州五大队前委：“……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五大队在这个环境中，非转变与七军（汇合？）。”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成立了红八军，在左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红

军第七军前敌委员会指定小平、昭礼、云逸、龙光、伯群、云甫、世昌七人组织之，小平为书记，昭礼为政治部主任，云逸为七军军长，小平、昭礼、云逸三人为常委”（小平即邓小平，昭礼即陈豪人，云逸即张云逸，龙光即李谦，伯群即韦拔群，云甫即雷经天，世昌即何世昌）。“军应设政治委员，指定小平为军部政治委员。”此时，军内才有政治委员的职务。

1930年5月中旬，邓小平带领特务连赶赴河池，在邓小平不在红七军的时间里，陈豪人仍主持着红七军前委的领导工作。

五、百色起义胜利后，陈豪人、张云逸等前委领导红七军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

1. 百色山城保卫战的胜利

在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建立不久，1929年12月中旬，百色城内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2000多人，趁红军主力离开百色之机，突然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并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当时，张云逸军长随主力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500多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文职人员。当时，军领导只有父亲陈豪人留在百色。他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分别给军部直属队、机枪连、教导队下达战斗任务。由于指挥正确，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奋战，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保卫了百色山城，显示了红七军的战斗力，同时也显示了陈豪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与胆略。（《红七军红八军烈士传》中有记载）

2. 前委向中央提出红七军的发展方向、土地分配等重大问题及保持红七军、红八军建制的建议

父亲于1930年1月给中央写了《七军前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请示红七军与朱毛会合的发展方向（后经中央批准）；请示有关土地分配问题的指示，并向中央反映了红八军领导干部力量十分薄弱，他对红八军的前途十分担忧，请求中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

《报告》中特别对中央意欲改变红七军、红八军建制的问题，提出了保留意见。《报告》中写道：“自平兄（注：小平）到龙（州）后，后方曾来两电，其一点拟四大队即第一师，五大队改为第二师，以明（李明瑞）为第七军军长，逸（张云逸）为一师师长，作（俞作豫）为二师师长，但我们接受此消息后，几次讨论决定四大队仍为七军，五大队为八军，明兄任总指挥，在七军方面统不致改名称而生影响，在明兄方面，据过去我们通电说明兄小住百色指挥，他必能□我军的影响及其势力之更大也。”由此可看出，父亲及前委肯定了李明瑞的影响力及作用。从稳定战局出发，正确贯彻党的统战政策，从战略高度来处理红七军和红八军的建制问题，建议中央应保留红七、红八军的建制，张云逸和俞作豫应分别担任军长，李明瑞担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中央军委接受了前委的建议。（上文中“平兄到龙后”，系指邓小平离开百色回上海汇报，路经龙州）

从1930年1月《中共中央有关人员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工作布置的讨论记录》中可看出当时中共中央有些同志对李明瑞的错误看法：“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在丝毫幻想，要加紧与他斗争，加紧在群众中宣传其军阀罪恶，加紧左江的下层群众的工作，以群众的力量来赶跑他，决无所谓暂时与他合作。”历史证明了，陈豪人为首的前委是正确的。

3. 攻打南宁，隆安战役失败的教训

父亲1931年3月9日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交代：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故前委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补充部队给养，决定游击南宁。当时前委估量蒋、桂正在混战，两败俱伤，无暇顾及南宁，广西反革命势力在南宁的力量极薄弱，七、八两军进攻南宁敌人颇有把握。可因政局变动，在隆安遭遇敌军袭击，激战数日后，力不及敌军而失败，前委的南宁游击策略未能实现。父亲在《总报告》中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此次策略之错误，主要的在于前委未在政治上有深刻的估计。南宁是政治中心地方，反革命无论如何必竭其全力以保守之……前委忽略了这一点，乃有此错误策略之决定。”还在《总报告》中详细记载了隆安战役之失利并痛心地缅怀牺牲的战友：“此役损失约一营人，沈静斋同志指挥四日未睡，彼原是体弱之人，退出时走不动，为其俘虏死难。沈同志在党内任一纵队队委书记，为官兵及同志们信仰亲爱之领袖，今尚有许多下级干部、士兵思念之。谈及此事尚觉得有所失。”

父亲认真地总结了隆安战役失败的四条教训，并以此为戒。我感到父亲是一位胸怀坦荡、勇于承担责任的红军领导人。

攻打南宁之战，据陆仰渊同志记载，最初是李明瑞的主张，他先侦知南宁敌情空虚，认为有机可乘，就到右江找张云逸商量联合夹击南宁的行动计划，被由陈豪人负责的红七军前委有保留地接受了，因而只派了第一纵队的一个营，先东移进占邻近南宁的隆安县城，再看形势发展。（见陆仰渊1989年著《百色起义与龙州起义》第78、79页）

4. 红七军深入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盘阳，前委决定向外扩大游击区域

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撤出隆安战斗，又经过平马、亭泗等遭遇战，处于困难时期。1930年4月初，父亲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率红七军主力部队深入到位处深山老林、地势险峻、群众基础好的盘阳地区，进行休整。在凤山县盘阳，父亲召开了前委会议，总结百色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了红七军向外游击的战略部署。父亲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有记载：“七军若困处右江偏僻的县份是没有出路的。由是前委乃有向外游击之决定。……即拟向湘、粤边界游击前进。”前委调整红七军的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进行土地革命，等待和红八军会合，决定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同时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弹药缺乏问题。

有些人将离开右江远征北上的红七军发展方向说成是李立三“左”倾错误所致，其实还有其他原因。邓小平在1931年4月29日的《七军工作报告》中明确写道：“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